

曾三 傳

裴桐題

賴世鶴 田真／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曾三傳

賴世鶴 田 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三传 / 赖世鹤, 田真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34-7047-9

I. ①曾… II. ①赖… ②田… III. ①曾三(1906~1990)—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788 号

责任编辑: 詹红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45 千字

版 式: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一

裴 桐

(中央档案馆原常务副馆长 中国档案学会原理事长)

赖世鹤同志告我,《北京档案》将要发表他和田真撰写的曾三同志传略性文章。我闻后十分高兴。曾三同志是我们所敬仰的党内老同志,我国文秘档案界的老前辈。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党的档案事业的无限热爱,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北京档案》一向注重利用刊物这个阵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相信,曾三同志的事迹一定会成为对广大档案工作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好教材。

1990年11月24日

序 二

冯子直

(国家档案局原局长)

我是15年前与《曾三传》这本书发生联系的。1999年，赖世鹤、田真同志，正在撰写《曾三传》建国后部分。他们将原稿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除了给其提供了一些史料外，为其写了一篇简要的序言——《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为〈曾三传〉建国后部分的写成而作》，并将书稿推荐给《中国档案报》社，请他们帮助予以连载。应该感谢档案报社他们从2001年1月4日起，连续刊登了传文，一直到4月12日登载完毕。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十年，即1990年，赖世鹤、田真同志就已经撰写成《曾三传》建国前部分，其时，《北京档案》正准备分期刊登。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就在此时，1990年11月28日晨，传主曾三同志因病逝世了。曾三同志也未能看到《北京档案》刊载他的这本传记。随即，在曾三同志逝世一个月以后，《北京档案》就从1991年1月开始，在刊物上连载了《曾三传》建国前部分。这个建国前部分的《曾三传》，是由曾三同志的亲密战友裴桐同志题写的书名，并写了序言（推荐词）指出：这本书所记载的“曾三同志的事迹，一定会成为对广大档案工作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好教材。”可惜当时我未能看到这个《曾三传》建国前部分。

我在看到了《曾三传》建国后部分以后，才设法找到十年前《北京档案》刊登的《曾三传》建国前部分。

读了《曾三传》全部，一个革命家的高大形象，一个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开拓者的高大形象，就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曾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先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生前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曾三同志在他 85 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他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1922 年就在湖南益阳、长沙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湘区农委秘书，1927 年担任湘区区委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30 年 5 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1 年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第一次无线电通讯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其他同志一起，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讯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跟随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38 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教员、政治处副主任。1940 年 3 月，到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返回延安后，先后任敌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等职务，担任过中央办公厅机要科政治协理员，1945 年任党中央秘书处处长，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 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在陕北保卫战中，根据党中央指示，曾三同志受命负责党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东渡黄河到晋绥，负责整理、保管档案。1948 年 5 月，又带着大批党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由山西到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 年又带着中央档案进驻北平，从而胜利地完成党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任务，为保存党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立下显著的功勋。同时，他在西柏坡时还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

的七届中全会的记录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同志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从建国初到“文革”前，曾三同志致力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开创、建设和发展。他提出了关于我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基本原则和工作方针任务的意见，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档案干部专业班、档案工作刊物和档案科研机构，积极倡导建立各级各类档案馆，在曾三同志的领导下，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门类齐全的档案馆网络初具规模，使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三同志从1958—1959年，就担任全国地方志小组组长。1980年代，又担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名誉会长等职务，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组织编纂全国新的社会主义地方志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曾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曾三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而努力！

赖世鹤、田真同志都是长期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长期受曾三同志言传身教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曾三同志生前，曾多次采访了曾三同志，曾三同志给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大量的历史回忆和史料，他们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他们撰写的《曾三传》，以质朴、白描的笔法，如实地记录了曾三同志一生革命活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和经历。在上卷，如实地记录了曾三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所从事的主要革命活动；在下卷，全面地记录了曾三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主要创建、建设和发展党和国家档案事业，主持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编纂工作活动的史实，从而给人们、特别是广大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

育的好教材，供他们学习。

我是1954年12月中旬调到国家档案局工作的，刚一到局上班，曾三同志就来看望新调来的同志，他问：你们在忙什么？我们回答说：国家档案局的成立，全国各地的档案工作者都很高兴，来了不少信件，我们忙着复信。他说，办信、复文是必要的，但是，你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国家档案局成立以后主要应该抓什么、抓什么事情。后来，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末期，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曾在曾三同志身边工作，担任他的业务秘书。“文革”后，80年代初期，又帮他做了一些秘书性质的工作。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教育，从学习、读书到工作，他都给我许多具体指点和帮助，对于我的健康成长，做好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期间，我也帮他做了一些事情。如我帮助他起草了一些在会议上的讲话，撰写了《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的文章，并在1980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予以全文整版刊登。帮他起草了1980年8月在“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在全国档案工作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几点意见》等，还参与了帮他编纂《曾三档案工作文集》等项工作。1990年11月28日曾三同志逝世后，我曾撰写了七、八篇文章怀念曾三同志，其中有一首词，回忆了曾三同志革命的一生：

岳麓学潮，申江电波，苏区“反剿”联络。

踏遍雪山草地，饮马延河。

受命护档晋绥，西柏坡，记录一页。

随领袖，入幽燕，迎来新中国。

无线通讯先驱，传信息，协助中央决策。

“二机”（指他在中办分管的机要局、机要交通局）、“双档案”
（指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夙夜呕心沥血。

立足档案战线，勇开拓、创立新业。难忘怀，一片丹心耀日月。

2014年11月8日是国家档案局成立60周年。12月12日，原来在国家档案局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召开座谈会，纪念这个节日。纪念

国家档案局成立 60 周年，人们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第一位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提了几点建议：首先，建议大家都来认真地学习《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其次，建议中国档案学会成立一个研究曾三档案实践和理论的学术委员会，专门研究曾三同志主持全国档案事业的实践和理论。第三，建议国家档案局将赖世鹤、田真同志等写的原由《北京档案》刊登的《曾三传》建国前部分和由《中国档案报》刊登的《曾三传》建国后部分予合并，付梓出版。

结果，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同意由国家档案局将《曾三传》前后两部分合并付梓出版，并且由杨冬权局长为曾老的传记撰写了序言。这是应该深表谢意的。

2015 年 5 月 7 日

沉痛附言：冯子直同志从 1954 年开始，就在曾三身边工作，近 40 年来，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珍贵的不可替代的情谊。冯子直一直把曾三看作是他的恩师、是他的好领导。他非常崇敬曾三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操和对新中国档案的卓越贡献。所以他非常关心《曾三传》的出版，早在 2001 年在《中国档案报》连载时，他都是每篇认真修改，在《后记》中我也谈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这次国家档案局在他的建议下同意出书时，他又一篇篇仔细审阅，病重时也不间断，他爱人张如玉说：“他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吃饭要叫几次才离开。”为了某个事件的日期准确，他翻箱倒柜找资料核实。他怕我找不到他修改的是哪几页，还在修改的那几页上贴上标签，这都需要坐着干才行。他写的序言，也是握着钢笔，一笔一划写成的。而这时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大夫几次准备让他再住院，可是，我问他时，他却笑笑说：“没有事（并把事字拉长了音），只是脚上的小毛病。”当他病情突然严重住院时，还把稿子带到医院里去了。他的儿子冯黎对谢丽荣（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编者）说：他爸爸在弥留的状态下还不断地说：“书稿、书稿。”他问谢丽荣：

“你知道是什么书稿吗？”谢丽荣告诉他，就是《曾三传》。

非常不幸的是，建国前部分在《北京档案》刊出前一个多月，曾三同志逝世了，这次出书前几个月冯子直同志又逝世了，老天呀！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

“冯子直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你的心愿，等书出版时，我们就首先献给你和曾三同志，到时还得麻烦你念给曾三同志听啦。拜托你了。”

赖世鹤

2015年7月16日

序 三

杨冬权

(国家档案局局长 中央档案馆馆长)

赖世鹤、田真同志为曾三同志写传，并非只因为曾老（我们一直都习惯这么叫）是国家档案局的局长或中央档案馆的馆长，而是因为曾老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创者，他创立了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很多个前所未有的，为后来的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例如：创办第一份全国性的档案工作期刊《材料工作通讯》；创办第一所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召开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并通过第一部全国性的文书档案工作条例；推动成立全国档案事务管理机构国家档案局并担任第一任局长；主持起草国家第一个档案工作行政规章《国务院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创建中央档案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推动促成开放历史档案这一中国档案工作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创举；创立中国档案学会等等。曾老对中国档案事业的这些创新之功、开辟之举，是值得传之于世、让后人铭记的。因此，作为曾老所开创的事业的后继者，我赞成出版《曾三传》。作者嘱我写个序，我也愿意写。

我是1982年到国家档案局参加档案工作的。但在此之前，我在大学读书时，就从曾老题名的《历史档案》杂志上知道他的名字。到国家档案局工作后，虽然更多地知道了曾老对档案工作的贡献，但此时曾老已不担任局长了，因此，也没有机会同他见面。大约是1982年的深秋，曾老生病住到北京医院，国家档案局抽一些年轻人，轮流到医院夜间陪护他。有一天晚上轮到了我，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知道我是南京

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便同我聊了一个晚上的历史，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古代的“二王八司马”到当代的“小将造反”；从普通人的生病，到领导人生病即“病夫治国”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等。他是我到当时为止所见到并面对面谈话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又十分谦和，不耻下问，他问我什么，我都尽其所知地告诉他，并很乐意把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告诉他，他也很愿意听并认为有所获益，并同我敞开心扉，讲了一些他很少同别人讲过的更不会公开讲的事。当然这些事后来我也没有同别人再说过。第二天早晨告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谦虚地说：感谢你给了我那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听着这位我所敬重的长者、智者对一个刚出校门、刚参加工作的后生所说的这句话，顿时觉得他胸襟的豁达、人格的崇高。那一晚，我真是如沐春风。

没想到，曾老出院后，有一天，他专门在官园把我们所有曾经陪护他住院的人请去一起招待了一次。席间，他介绍说，今天做饭的厨师，是当年为刘少奇同志服务的郝苗。这是我第一次被省部级领导宴请招待，也是第一次在官园这样曾经有很多中央领导住过的、比较知名的地方用餐，更是第一次享用由中央领导人的厨师亲手做的饭菜，所以非常高兴，同时也十分感慨。因为本来一个单位的老领导生病住院，本单位年轻人去陪护一下，是很应该也很平常的事，但曾老却惦记着我们这些曾经陪护过他的年轻人，专门设宴感谢我们，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这种领导风范、长者风范是多么值得学习啊。从这件事上，我更加感受到曾老人格的崇高。

1990年11月28日下午快下班时，我的司长郝存厚从郊区开会回来，告诉了我们曾老去世的噩耗，并告诉我，局长冯子直指名让我连夜起草曾老的生平。我怀着对曾老的崇敬和怀念，在自己家窄小的平房中，靠着蜂窝煤炉，熬了一宿，饱含深情，写出了曾老的生平，经一些老同志讨论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至今，我还为我能亲手撰写曾老生平而感到荣幸。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参加档案工作8年多的副处长，在国家档案局，比我工作时间长、职位高、对曾老接触了解多的

人有的是，但局长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所以，我真的倍感荣幸。

更让我倍感荣幸的是，2006年，我担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在曾老当年开创的事业基础上，继承曾老的遗志，与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一起，开始进行档案工作的新征程。今天，我们正以建设档案强国的新业绩来充实丰富曾老当年的规划，进一步实现曾老当年的梦想与宏图，告慰九泉之下的曾老。今天，当我写这篇序时，已年满花甲，即将卸任。我相信，未来，档案工作者还会以更大、更辉煌的业绩告慰曾老。

让我终生遗憾的是，曾老去世后，我因忙于会务，未能到曾老的家中八宝山公墓去向曾老告别、去祭奠曾老。今天的这篇序，就当做我献给曾老、纪念曾老的一瓣心香吧！

2015年4月26日于北京寓所

楔 子

湖南自古称为芙蓉之国，水碧沙明之乡。公元一九〇六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曾三就诞生在这个芙蓉之国的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曾三父辈兄弟四人，他的父亲排行第四，名月卿，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月卿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心灵手巧，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是当地有名的务农里手。他为人忠厚老实，在乡里人缘很好。曾三的母亲王氏，性情温顺善良，勤劳朴实，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王氏生有三男一女，长子吉元、次子海楼、三子海云（即曾三），女儿风莲早逝。由于月卿夫妇的勤俭持家，他们的家境虽说不上十分富足，但仍不失为一个殷实之家。这为曾三的成长及日后求学，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曾三的家乡益阳，因地处宜益水之阳而得名。它位于湘中偏北，在资水的中下游。它北倚雪峰山，环抱洞庭湖，是个山清水秀、地杰人灵的好地方。相传在战国时代，楚国的大政治家、大诗人屈原被流放江南时，曾经辗转到过益阳的桃花江畔。在桃花江的东岸，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这里峰峦起伏，悬崖绝壁，古木参天，楼阁画梁，时隐时现。屈原途中到达桃花江畔时，曾经登上此山，手持宝剑，向天发问，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问了将近三天三夜。屈原的发问，像一团团的烈火，一支支的利剑，直指苍穹。天帝闻声大怒，急令风神、雨神和雷神到山上施虐。顿时，山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天昏地暗，使人无法站立。但屈原却不畏强暴，像一名伟大的骑士，与它们搏斗。屈原的战斗精神，以其洪亮的慷慨之声响彻了祖国的大地，传遍了三山五岳。这时

一对凤凰从南边飞来，它们张开美丽的双翅，为屈原挡风遮雨。因此，后人就称此山为凤凰山。山上建有凤凰庙，将凤凰封为凤凰神。在屈原作天问的地方，建有天问阁，高十八米，有五层雕梁画栋，看去十分壮观。相传每到风雨交加之夜，人们走近天问阁时，就能听到屈原质问天帝之声。益阳人民特别尊崇屈原的高尚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特在桃花江畔修建了屈子祠，占地两千平方米，建有陈列馆，立有大诗碑，刻有《离骚》、《天问》等宏大诗篇。屈原一生的坚贞不屈及其成就，不仅直接蕴育了浓厚的楚湘文化，而且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益阳这个地方虽然地域不大，但由于受楚湘文化的熏陶，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早在清代嘉庆年间，益阳就出现了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陶澍。他是嘉庆进士，少年得志，聪慧异常，由翰林编修升为御史。道光时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并兼管盐政。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陶渊明集辑注》等。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湖南这个革命大摇篮中，益阳又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者和文化先驱。他们是曾三、周谷城、周扬、周立波、叶紫等。其中，曾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前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周谷城、周扬、周立波和叶紫，后来都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周谷城是中外闻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等职。著有《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世界通史》等。周扬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出版有《周扬文集》等。周立波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及报告文学《王震将军记》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曾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其代表作《暴风骤雨》，曾于一九五一年获得斯大林文学三等奖。出版有《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周立波选集》

(七卷本)、《周立波三十年文学评论》等。曾任《人民文学》编委、作家文学理事、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以上周谷城、周扬、周立波被誉为益阳“文坛三杰”。叶紫是我国“左联”时期有过显著影响的革命作家之一，当一九二六年湖南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时候，他才十四岁，正在当地中学念书，他的一个叔叔是益阳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担任县农民协会的副会长兼自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其叔叔的影响下，他的父亲和姐姐以及他本人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他自己也被反动派到处搜捕，因亲友的掩护才得逃出了充满白色恐怖的家乡。叶紫的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产生显著的影响，显然不仅是由于他在艺术上有了较高的成就，主要是他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当时的农村阶级斗争。其代表作为《丰收》和《山村一夜》等。鲁迅先生曾为其《丰收》作序，并在其生活困难时曾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上述这些革命者的出现，又为益阳人民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田 真

我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写《曾三传》？

曾三同志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他自 1945 年调到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处长以后，就一心扑在档案工作上，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增强了他在档案事业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刻苦钻研，不断探索，要彻底改变档案工作的落后面貌，要使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从无到有，从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档案、不知道怎么整理档案到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档案专修班、历史档案系，在各省、市至少有一所大学成立了档案系或档案专业，紧接着又成立了领导全国档案工作的国家档案局，还同时在全国普遍成立了省、市、县档案局。习仲勋在他为《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作序说：这就“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的全国档案网络和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曾三，就不可能这么快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所以，写曾三也就是写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这是前辈留给我们后人的多么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财富，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忠实的记录下来，要牢牢地铭记在心，不然我们就会忘掉历史，对不住前辈。这就是我们执意要写《曾三传》的原因。

我在写《曾三传》之前，原先准备写一部《新中国档案工作史迹》，有几篇也请曾三看过，他也作了修改。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给我修改稿子时，是多么困难，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因为他的一只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经受不了劳动的重负已经瞎了，另一只眼睛也只有很微弱的